

导论 经济利益关系与 社会道德范畴

马克思说：“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①恩格斯也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③奠基在一定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作为道德规范体系组成部分的道德范畴，其产生、存在和发展，都同经济利益关系密不可分，都要受制于一定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承认道德范畴同经济关系的必然联系，决定着对道德范畴本质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与解决。要从理论形态上把握道德范畴的科学意义，就必须研究人的需要、人的利益、经济关系、道德范畴所涉猎的基本理论及其内在逻辑。建立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范畴体系，是当今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者所面临的使命和任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8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一、需要是利益的前提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中，体现一定的利益要求，受到一定道德的制约。作为道德规范体系组成部分的道德范畴，虽是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产物，为一定经济利益所决定，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利益，又是以比较强烈地、持久地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总是离不开人的需要的。需要是利益的手段和前提。正确认识需要的客观规定性、需要的形成、需要的满足和需要的控制，是科学揭示利益的本质、道德范畴的基础的关键。

怎样理解需要？概言之，需要就是有机体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依赖和要求。无机物是无所谓需要的。尽管凡有生命的物体都存在需要，但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需要是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与人的欲望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尽管客观存在的“需要”，也可以被感知、被人反映，但“需要”和“欲望”毕竟是两个有原则区别的概念。人的需要既不是人的纯主观的产物，也不是任何个人的随意想象，而是客观世界和客观过程引起的一种必然性，是人类对自然界、以及人类在社会内部对群体的一种必然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不以任何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只有客观需要被人的意识感知后，才能成为人的主观欲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以把利益说成是纯主观的东西，就在于他们混淆了需要和欲望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抹煞了二者间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认为，人的需要同人的本质有着内在联系。人的需要是人的属性，而且还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

思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①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就是按人的本性分配。“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今我国，尽管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政策，但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可以而且必须按照社会需要来组织生产。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的同时，也承认人的本性的丧失就是人的需要的丧失的结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建立在有限生产力基础上的自发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既造成了人的需要的自我分裂，也造成了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对立和冲突，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是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些人得到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就经常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暂时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性。人并非为了需要来到人间，但人一旦来到人间就会在改造世界活动中产生需要，创造自己的本质。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的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的需要体现着不同的本质。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网络结构，每个社会个体就是这个网上的纽结。每个社会个体，因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各有差异，由其决定的人的本质也必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5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7—638页。

同。不同的需要集中体现了不同的本质。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需要，就是同一人、同一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其需要也是不同的。世界上的人际间之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需要，就是因为人际间没有完全相同的社会关系和本质。第二，发展的需要体现着发展的本质。人的需要是一条处在运动、变化中的永恒奔腾的河流，在满足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这是人的需要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法。列宁称这个辩证法为“需求的上升规律”。正是这个“上升规律”，才使人的需要从原始的生命延续发展到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历史的演进，不仅推动了自然界以及社会的变化，改造了客观世界，而且还把实践成果积淀在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中，使人的自身也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了的人的本质，就直接外化为现代人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精神需要。第三，人的需要最终将与人的本质合二而一。社会在发展，人的需要在变化。人的需要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渗透的结果，必然作为一种统一形态集中在劳动上，使人的需要发生质变。由为了需要而劳动，转化为为了劳动而需要。到了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劳动，也正是消除了内部对立与差距后的人的本质。人们全面地、直接地占有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的需要，也就全面地、直接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到了那时，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从来自一个共同的起点，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又最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同一。这种新的同一的出现，标志着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

人的需要的形成是一个辩证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人对客观世界依赖性的需要，它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自然形成的，一种是由社会形成的。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都具有多种属性。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前者决定了人和动物一样，有对衣、食、住等生存或生理的需要；后者则决定了人所有的学

习、教养、交往、发展、创造等而动物所不能有的需要。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人的需要的形成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但从本质上说，则都是“社会创造的需要”。原因在于，在社会存在及其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即使原先是一些纯粹的生存需要或生理的自然需要，也会逐渐地、自然地失去其自然色彩，进入“社会创造的需要”的范围。事实上，人的需要只有进入“社会创造”的范围，才能成为人的实际需要。普列汉诺夫说：“什么是实际的需要呢？在我们的哲学家看来，首先就是生理的需要，但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必须生产某些物品，而这种生产的进步，又使另一些需要发生，这些需要和原有那些需要同样地实际，不过它们的性质不再是生理的了，它们是经济的，因为这些需要是生产发展所引起的后果，是人们在生产进步中必须进入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后果。”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人的需要的形成，是很有的启迪的。

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网络状的结构体系。内容纷繁复杂。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也包括创造和享有文化财富的精神需要；既包括吃饭、穿衣等消费需要，也包括用粮食制食品、用棉布做衣服等生产需要。此外，人们还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区分出不同类型的需要。就其发展过程讲，人的需要可以分为表现为饮食男女的人体机能性的自然需要和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超出人体机能性层次之上的社会需要。在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自然需要是社会需要的基础和前提，社会需要则是自然需要的发展和质变。如是人的自然需要离开了社会性，那自然需要就只能是动物的机能。就其存在状况讲，人的需要可以分为客观需要和表现主观欲求或情欲的主观需要。二者是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9—130页。

密相联的、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 任何需要都是主体的需要 具有主观性；但任何需要又都是具有对象性的东西，是由客观规定的。严格地说，不仅人的主观需要还不是需要本身，而是对需要的主观意念或反映，只有当它作为主体活动的内部条件、表现为人的欲求状态并产生了明确的目标指向时才成为需要，而且即是人的“主观需要”，也只是由一种特殊方式表现出来的客观需要。就其表现形式讲 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个体需要和体现社会共同利益、共同愿望的社会需要。它们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要看到个体需要的千差万别，也要看到社会需要的共同性和稳定性；既要承认个人需要必须服从社会需要，又要强调个人需要对社会需要的服从，必须具有正当性，承认个人需要存在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需要也不可忽视，个人需要的存在和满足，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就其性质讲，人的需要可以分为合理的、正当的需要和不合理的、不正当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以社会可能为前提的、合乎社会发展尺度的需要，是合理的、正当的需要；反之，就是不合理、不正当的需要。就其生存活动领域讲，人的需要可以分为诸如吃、穿、住、用方面的物质资料需要和表现为求知、社交、创造方面的精神（心理）需要。物质需要固然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然而精神需要则是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需要的根本标志。人的需要越发展，人们就越把精神需要当作人的需要的重要内容。不过，人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没有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就无以立足；同样的，没有精神需要，物质需要就失去了人的需要的意义。完全可以这样说，物质需要给了人的血肉，是人的基础；精神需要则给人的灵魂，是人的主导。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精神需要保证着物质需要发展的方向。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看，社会满足人

的需要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发展至今，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有很大发展。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的“剩余精力”即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外的精力，将随着社会的演进会越来越多。把“剩余精力转到满足精神需要的发展方面，让精神需要主导物质需要，这是现代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现代人在人生需要观上应具有的意识。有了这种精神需要的主导，就能使人对物质需要持正确态度，正确把握社会尺度：就能抵制各种不合理的物质需要的腐蚀侵袭，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于导致需要的病变；就会使生活有明确的理想和目的，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和矛盾，正确对待各种利益。一句话，只有用精神需要主导物质需要，才能使外在的物质需要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的精神需要的东西，使人由外部满足转化为从内部得到充实；使人的境界高尚、视野开阔，保持旺盛激情，充满革命乐观精神。其二，精神需要的水平体现着人全面发展的程度。全部人类的历史，既是人类生产史，也是人类自我改造、自我塑造的全面发展史。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通过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既做自然、社会的主人，也做自身的主人；不仅能对客观世界能作理性思维，而且能感性地把握它，使客观一切能真正成为自己的对象，成为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要做自然的主人，就要追求自然科学，掌握自然规律；要做社会的主人，就要通晓历史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要做自身的主人，就要具有远大理想、高尚情操、锐敏思想和丰富、全面而深刻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属于精神需要范畴。作为自然、社会、自身主人的社会个体，是否具有这些需要，在什么程度上具有这些需要，这是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水平的标志。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断论：精神需要主导着物质需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区别于动物需要的人的需要，无论是社会的总体需要还是

个体需要，都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动态和静态相统一的体系。在把握需要发展运动趋势的前提下，对人的需要的内部结构进行静态考察，研究其层次结构的规律及其功能，对于我们具体地、准确地把握人的需要，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几十年来，不少西方学者，对需要的层次结构进行了认真探索和深入研究。西方行为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莫梭，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说”。阿德佛根据他对工人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生存、相互关系和谐、成长三种。摩莱于1938年在《人格的探索》中，列举了20余种人的需要。然而在这些需要结构理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还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论”。1940年仅有32岁的马斯洛，就在美国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灵长类优势品质和社会行为》一文。继后，又于1943年出版了他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1954年出版了他的《动机与人格》一书；1962年出版了他的《存在心理学导言》一书。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可以归纳为五类，这五类需要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在马斯洛看来，人类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一类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前者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后者称为高级需要。这两类需要的关系，表现在五种需要层次中就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一个层次的需要得以相对的满足，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尽管同一时期内可能存在多种需要，但每一时期内总有一种需要是占支配地位的；需要满足了，它就不再是一种激励的力量。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虽在西方广泛地应用于管理心理学，但西方的管理心理学家，对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的评价是各不相同的。总的说来，他们既重视需要理论又指出这一理论的不足。美国管理心理学家列维特在

评价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时说，马斯洛理论的有效性、科学性是经常受到人们的争论，但它的效用对于管理者可以成为一种思考的工具，似乎优点总是超过它存在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观点看问题 要正确评价马斯洛的需要理论 就必须联系他的哲学观点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观点进行客观的、历史的考察。既考察这一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也考察这一理论在一定时期内的进步作用及其局限性。历史地看，人本主义心理学，无论在批判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论，还是在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异，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内在因素和人的特殊性，都是具有深远的进步历史意义。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一种内容型的激励理论。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从其科学性的一面看，它作为一种激励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的。表现在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地立论于人的需要的。人受到刺激产生了需要，需要不满足时，引起心理紧张，就成为寻找目标以满足需要的驱动力，由此而激发了动机。从研究需要着手来探索激励，是符合心理发展的有效途径。表现在需要理论的社会作用上，马斯洛从人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不仅抓住了人的问题的关键，使人为了更好的满足自身生存、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在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强力推动下，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而且形成了逐级上升的模式，指出人的共同心理过程，就是人的需要层次和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趋向。此外，还表现在需要理论指出了人的需要按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只有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要，采取不同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为企业管理指出了调动积极性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从其局根性看，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有很偏颇的。体现在：它所强调的需要仅是个人需要，没有不是以私利为出发点的；它所强

调的需要，大部分都是自然需要，没有、也不可能广泛涉及社会需要问题；在高层次与低层次的需要之间，马斯洛认为：只有满足上一层次的需要之后才能进入下一层次的需要，形而上学地看待由低到高、逐级递升，只注意到下层次需要对上层次需要的制约作用，而又忽视了上层次需要对下层次需要的反作用，只看到各层次间的依赖性、联系性，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忽视需要层次越高、能动性越大的情况，马斯洛只注意需要的纵向发展，忽视了横向发展的后果，虽然马斯洛认为低层次需要只有在相当满足的前提下才能产生高层次的需要，但什么程度才算相当满足，其标准是什么，他就很难确定，每一层次的需要都是质量的统一，都有量的规定，一旦超过了量的界定就会引起质变，扭转需要的发展方向，忽视了个体需要结构的多样性，不同个体需要系统中的五个层次的联结并非一个整齐的阶梯，而是一个参差不齐、有主有次的，每个个体既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需要，也不可能相同的结构中所强调的重点都是完全一样的，不仅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世界观、不同人生观的人所强调的重点要层次不同，而且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中处于不同环境、具有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所强调的需要层次也不同，艺术修养、认识水平和生活阅历等因素都会参与人们对需要结构中重点的确定。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对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既要看到它反映了需要内部构成的一般特点，又要看到这不是一个人都具有的唯一模式，既要看到它基本把握住了在需要上个体的心理特征，也要看到它忽视了社会复杂关系的制约，既要看到它注意到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也要看到它并没有概括尽人需要的全部，尤其是他把人的“自我实现”当作最高层次的需要，更是表现出了这一理论的限制性。人生实践告诉人们，需要的最高层次不是“自我”而是社会“公共利益”人的真正目的（即最大需要）

是社会的改造和发展，人只有在社会的需要并为社会需要而奋斗中，才能把自己的条件和禀赋出来，离开了社会需要的“自我实现”就只能是一句毫无现实意义的空话。

目前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西方需要层次理论的研究为什么要这样大动笔墨呢？这是一种含混的、片面的看法，至少可以认为这些“好心肠”的人，看轻了以马斯洛为代表的需要层次论在我国研究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对于需要层次理论的研究，究竟有何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呢？其理论意义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第一，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伴随着人类需要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社会发展过程体现着较高需要层次不断取代较低需要层次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需要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最初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需要，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要素”。从社会意义，马克思曾将生产劳动定义为“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需要称之为生产力的动力，即需要推动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反过来又为更高需要的出现奠定现实基础。需要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而发展的”。在人的需要随着人们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社会生产的发展得到了量的满足后，就会引起需要的质变，产生跨阶梯、跨层次的必然过程，人就在这种每一次新的需要层次的满足推动下，不断地为满足自己更新更高的需要而创造着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二，人的需要既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制于社会。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现象，人们生活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必然反映在人的需要意识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确定的、现实的人的规定、使命和任务，都是由人的需要及其与

现存世界的联系所产生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从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也就是说，需要本身不是取决于人的意识、意志及其生理、心理感受，而是取决于社会发展状况，把人的行为动机理解为思维而不是需要的观点和看法是错误的。每个时期的人的物质需要，总是以先前达到的程度为出发点的。第三，需要层次理论是一个历史范畴。不仅第一层次需要的完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层次概念、理论的提出也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既是生产有了一定发展的标志，又是生产发展不足的标志。需要层次理论，是同人的占存观念或私有观念分不开的。完全可以预料，在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物质产品达到极大丰富时人的需要就会直接表现为社会需要。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是现存的，但这种需要却只能归于整个社会而不能归于某个集团，在能够享受最为自由、最为和谐的爱情生活时人们的彼此尊重、相互帮助就已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到那时，人的需要概念就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正确认识“自我”、充分发挥“自我”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贡献。

“需要层次论”的理论研究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的实践意义。首先，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的增长程度及其表现形式，把人的需要具体地、图示性地展示在人们生活面前，使人们更能准确地把握客观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状态，有意识地积极增加种类不同、形式多样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适应人们需要阶梯的并存性与需要的多样性，使人们不仅要注意到增加产品的数量，丰富人的生活，而且要提高产品的质量，通过发展生产的办法来提高人们不断发展的、新层次的需要。从另一视野审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

生产不断增长、不断完善的方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正确性。其次，它深刻地说明了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具体表现为人的需要。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需要层次论”的“需要”概念，实际上是利益概念。以往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不重视生产单位的物质利益，尤其不重视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的错误倾向而严重阻碍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发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是付过高昂的学费的。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在保证国家、集体利益的前提下，特别注意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所以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就是要提高人们需要的质；所以要以责权利相结合为原则，就是要给企业以“压力”与“活力”，促使企业努力发展生产、增加赢利，给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也使个人在作出更大贡献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

人的需要诚然是人的本性的体现，但人的需要根本不同于动物的需要，有着自身固有的、动物需要远远不能比拟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需要的客观社会化。马克思所讲的确定的、现实的人的规定、任务和使命是由人的需要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就是指的需要客观性而言的。人的需要的客观性，是说人的需要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诱发需要的动机、实际需要的内容、满足需要的方式，都是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认为需要是有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人的需要是人类生存、发展和延续的直接反映，也是人体包括人脑机能在内的客观要求。人的需要一旦停止，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不仅人的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是随着人的生命活动在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展开而展

开，人的需要的确定，表面上是一种作为主观目的和动机出现的欲求形式，具有任意性、随机性和选择性的特点，但这种主观形式、自由表现背后却深藏着客观的、不自由的规定，受着客观存在的制约，而且人的需要的产生、诱发需要产生的客观依据，都既不是取决于人的意志、愿望和心理、生理的感受，也不是取决于主观心生的欲念，而是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存在，是对现实变形的反映。人的任何需要都是某种客观存在，具有某种对象性的东西。人的需要的这种对象性、现实性和实在性，正是人的需要客观性的体现。至于满足需要的方式和手段，更是具有客观性。

人的需要有客观性也有社会历史性。马克思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①人是社会动物。一方面，作为大自然产物的人，他不可能完全改变自然规定的性能和机制，不会没有任何自然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劳动产物的人，他的需要又不能不具有社会性，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传统习惯、生活环境等因素，又不能不决定着人的个体需要的内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在劳动实践中，既改造着自然，也改造着自身。即使是人的机能性的需要，也要受到社会的冶炼，熔进新的内容和增进新质，自然性需要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社会性需要的形式之中。无论是需要的产生、评判需要的尺度还是满足需要的方式，都要受制于人的社会性。鲜明的社会性，是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的需要的最根本的特性。

人的这种特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需要的时代性、阶级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0页。

和阶段性。人的需要是由历史决定的，具有时代性。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对一定对象的需要。作为对象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客观环境，通过人的社会实践规定着人的需要。客观环境的改造和人的需要的发展，是实践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古代王公贵族不会有今天普通人具有的某些需要；现代人的某些引为自豪的需要，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会显得十分可怜。70年代青年结婚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停留在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上，而80年代青年结婚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却发展到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上。上个世纪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愿望只停留在征服地球本身范围内，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人类不仅有了征服宇宙的欲望，而且有了航空、航天的壮举。社会生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需要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由于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集中表现为阶级性，人的需要在阶级社会里也具有深刻的阶级性，打上一定阶级的烙印。一个宝珠商，对宝珠的价值特感兴趣；一个饿肚子的穷人，甚至对西湖的美景也无心观赏。不仅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的需要有所区别，就是同一个人在其人生旅程各个发展阶段上的需要也是有所差异的。不但随着人的生理、心理的发展变化使其需要也不断变化，显出需要发展的阶段性，同时各个阶段的主导需要因客观条件、客观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父母慈爱是人的幼年时期的特别需要；好奇心的满足是人的少年时期的特别需要；寻求职业和爱情的称心如意是人的青年时期的特别需要；希望事业能得到成功是人的壮年时期的特别需要；盼望受到晚辈的尊重是人的老年时期的特别需要。

（二）特有的社会意识化。人的需要的社会意识化，是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需要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人的需要的形成是有机体长期演进的结果。从生物进化来说，无机物是无所谓需

要的。从无机物演进为有机物以后，有机体的原始需要是生存性需要，即保证自身不被消灭或毁灭；有机体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新陈代谢，就使满足生存性需要的手段转化为有机体的生理性需要；要对外界刺激作出正确的及时的反映，使有机体能趋利避害，就需产生信息性的需要；通过漫长的进化，有机体的反映形式逐渐由生物感应性发展为感觉、知觉以及心理反映形式。伴随着反映形式的完善，有机体对外界环境与自身的关系逐渐有所体验，产生了为保证有机体对客观外界接踵而至的同类刺激作出恰当应答性的、连续性反映的、为高等性的动物所特有的原始情绪。不仅非人灵长类已有了思维萌芽，能对外部环境与自身关系进行简单思考，原始情绪由满足需要的手段转化为新的需要，而且灵长类中的一部分开始采用有预期目的的行为以改造外部环境，改造的形式就是对外部环境进行能动反映的实践。在实践由满足心理性需要的手段转化为需要本身时，一方面出现了实践需要，实现了由猿到人的转变，另一方面人又在实践交往中创造了语言，产生了人的意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当人感到有必要预料自身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起的变化时，预见便由实践性需要的手段转化为新的需要，出现了成就性需要。这种成就性的需要，既是与人的未来相联系的需要，也标志着正在形成中的人进化为完全形成的人。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人的需要是从动物需要演进而来的，是社会意识化的结果。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需要的社会意识化是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需要的又一根本特性。

需要的社会意识化，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需要的驱动性、递进性、选择性和可控性。

这里讲的需要的驱动性，是指人的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都要受需要的驱使和推动。从表层看，思想产生行动，或者

说“行动从思想来”，但实际上，思想并不是行为发生的直接根源。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人们只习惯于从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世界观。人永远处在某种需要状态中，人的需要贯穿人的生命的全过程。人的行为发生、变化，追根溯源都来自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行为发生的原动力，也是把人的需要从一个阶梯推向另一个阶梯的自我力量。对一个人来说，人的需要的满足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是绝对的，总是具有递进性的。正是从这一意义说，人的需要很像个无底洞，是永远也不能达到满足的顶峰的。这就是人的需要发展的历史辩证法。由于人的生活像个万花筒，纷繁复杂，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种各样，由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人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当人们面临各种需要发生矛盾的条件下，都存在一个择优录取问题。人的需要的这种优选性，是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需要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儒家先师孟子，曾经讲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①这是孟子对人的需要选择性的极好说明。在孟子看来，鱼和熊掌虽是我所欲的需要，但“鱼”的价值和营养远不及“熊掌”，在二者不可得兼时，就应舍鱼而取熊掌；生和义也虽是我所欲的需要，但因“生”是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义”是高层次的道德需要，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就应舍生取义。由此可以看出，人的需要选择性都是要受一定意识支配的，既要受对象的性质与价值制约，对人的价值越高就越易于产生优势的需要，也要受人的社会化程度、心理意识发展水平、道德修养状况以及人生价值观的制约。在人的社

^① 《孟子·告子章句上》。